

曾德昭與中國科舉考試

António Aresta*

曾德昭¹所著《大中國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被恰如其分地認為是葡萄牙漢學²及歐洲漢學濫觴的扛鼎作品之一。這本著作完成之時，歐洲人按照自我稜鏡的思維方式拒絕接受多維結構的中華文明。

《大中國志》章節手稿完成於1637年，同年笛卡爾出版《方法論》。1640年全部書稿殺青。1642年西班牙文首版，1643、1653、1667和1678義大利文版，1670年荷蘭文版，1645和1667年法文版，1665年英文版相繼問世。其他文字或有譯本，但非完整和信實的版本。

1731年里斯本*Officina Herreriana*出版社出版馬努埃爾·法利亞·索薩（Manoel de Faria e Sousa）負責整理的上下兩卷。三個世紀之後的1956年³，著名葡萄牙漢學家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⁴出版《大中國志》的首部葡萄牙文譯本。

* Professor e Investigador de Portugal.

1. 曾德昭1585年生於Portalegre地區的Alentejano de Nisa，1658年7月18日逝於廣州。1602年4月30日加入耶穌會，在埃武拉和果阿完成哲學和神學課程，1613年加入中國傳教團，1645年至1650年、1654至1657年兩度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省長。
2. António Aresta：《漢學（A Sinologia）》，收於Adalberto Dias de Carvalho主編：《教育哲學辭典（*Dicionário de Filosofia da Educação*）》，Porto Editora，2006年，第347-348頁；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漢學（A Sinologia Portuguesa）》，《文化雜誌》，第32期，1997年，第9-18頁；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教育歷史中漢學研究之總覽（Os Estudos Sínicos no Panorama da História da Educação em Portugal）》，《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總第38期，1997年，第1045-1069頁。關於葡萄牙漢學的最新著作是*A Mulher na China* de Ana Cristina Alves（Editorial Tágide，2007）。
3. 《大中國志》葡文版，由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撰前言，Notícias de Macau，1956年，2卷。1994年第二版，由António Aresta撰前言，沿用第一版內容，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和澳門基金會編輯。本文是在第二版前言的基礎上所做的改進。
4. 關於作者參見António Aresta：《高美士老師與中國文化的教育傳播（*O Professor Luís Gonzaga Gomes e a Divulgação Pedagógica da Cultura Chinesa*）》，《澳門公共行政雜誌》，2001年總第54期，第1535-1558頁。白姐麗(Graciete Batalha)，《路易士·

曾德昭著作在世界的廣泛傳播歸功於他對天朝帝國所做的翔實描寫和嚴謹分析。儘管如此，仍然無法掩飾文中體現出的天主教倫理和道德教育理念。漢學史家這樣評價曾德昭，儘管他的教育是在埃武拉和果阿完成的，但他卻擁有一個異鄉人的靈魂。

曾德昭對中國文化的所有知識來源於他在中國多年的生活。“我希望這份成果贏得尊重和信譽，即便不是因為它所呈現出的恢宏卓絕，至少也為了它可靠的真實性。我選擇寫下的內容來自我親眼目睹的事實。儘管我的視力不佳，但我總是反覆觀察。一個人以長時段的眼光觀察事物，即使視力不佳，總是勝過視力完好卻執著於表面的人。我矚目中國已有22年之久，分辨得清楚自己所寫的東西和那些沒有經過實踐而寫下的內容。我將盡量講述貼切，儘管這樣做有損文風。”⁵他還在別處表示⁶，“亞里士多德對亞洲人的評價不可否認，亞洲人在技藝方面勝過歐洲，但是後者的勇氣勝過前者。這點已由經驗證明。如今很多人稱呼中國人蠻族，就如稱呼幾內亞的黑人和巴西的tapuyi人一樣。我為聽到有人這樣評價而感到羞愧。在中國游歷多年的經驗證明他們的話恰好相反。中國的名譽和活動足以令他們信服。多年以來我們聽到的傳言和我們親眼見到的現實便是如此”這本書至少可以中止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普遍⁷誤解繼續傳播。

歐洲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是通過耶穌會為中介建立的。他們是名副其實的科學文化大使。但如此的地位卻無法令他們免受迫害。因為一位中國文士沈淮的奏疏，曾德昭於1616年被捕入獄。之後他被關進竹籠車從南京押往廣東。一個多月的旅途中他遭受折磨和凌辱。自廣州，曾德昭又與其他來自北京的神父一起被押往澳門。

賈沙華·高美士與中葡文化交流（*Luís Gonzaga Gomes e o Intercâmbio Cultural Luso-Chinês*），澳門國際研究所，2007年；黎祖智（Jorge Rangel）：《路居士·賈沙華·高美士誕辰百年（*Luís Gonzaga Gome*）》，澳門國際研究所，2007年。

5. 曾德昭（Álvaro Semedo），《大中國志（*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第二版，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和澳門基金會，1994年（共416頁），第20頁。本文對《大中國志》的引文均出自這個版本。
6.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66至67頁。
7. 阿馬多·阿拉伊斯修士（D. Frei Amador Arrais）：《對話（*Diálogos*）》，M·洛佩斯·阿爾梅伊達（M. Lopes de Almeida）做前言並編輯，波爾多（Lello & Irmão），1974年，第299頁。第一版1589年。

曾德昭著作對歐洲文化，尤其對啓蒙思想的影響巨大。就如維吉爾·畢諾（Virgile Pinot）和裴化行（Bernard-Henri Maître）考證的那樣，它為中國對歐洲哲學思想的影響以及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的關係做出了貢獻。

思想家諸如伏爾泰、沃爾夫、孟德斯鳩、笛卡爾和蒙田參與了儒家思想與啓蒙思想的交流。為數不多來到歐洲的中國人如楊德旺（Yang Te Wang）和高麗殊（Kao Lei Szu）為東西方架起了無與倫比的橋樑。黃嘉略（Arcádio Huang）成為了國王路易十四的翻譯。這一切推動了“中國風”的形成，同時也孕育“中國熱”和“黃禍”這對矛盾的產生。它在法國和德國影響尤其深遠。王夫之⁸的例子則以不同的方式體現出哲學與智慧之間方法的變化。王夫之的例子在歐洲啓蒙運動的結束時再次顯現。

1545—1563年天特會議的舉行，天主教大學和學校的新規定的制定，以及1632年誇美紐斯（Comenius）《大教學論（*Didáctica Magna*）》的出版，彙入了這股席卷歐洲的革新浪潮，推動了科學的發展以及新的權利觀念的誕生。

漢學研究的輝煌成就與耶穌會士息息相關。這一切始於日本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ro Valignano）於1585年12月23日自果阿寫給埃武拉主教德托尼奧·德·布拉干薩（D. Teotónio de Bragança）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了居住在澳門的傳教士學習漢語及中國文化的必要性。漢語⁹“似乎是全世界最難的語言。聽上去好像都是單音節，簡短且易混淆。神父們缺乏老師指導，也缺乏翻譯為他們解釋，因此他們無法理解中國人，中國人也無法理解他們。但是，通過聰明才智和不懈努力，他們說服和征服了中國人，即使口語和發音無法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但至少他們找到了漢語的精髓所在，並且將其用簡明的方式表達出來，方便後來者學習。除此以外神父們還學習文學。文學因其體大繁雜而成為最艱深的學問。除了擔任其他事務，神父們盡心盡力地習文練字，讀書撰文，利用天主教出版了很多漢語著作。”

8. 謝和耐（Jacques Gernet），《中國人的智慧（*L'Intelligence de la Chine. Le Social et le Mental*）》，伽利瑪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1994年，第303-312頁。

9.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295至296頁。

羅明堅（Michelle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o Ricci）初到澳門不久，就將漢語學習視為不懈的追求。“澳門有一常設神學院。許多人在此接受了教育，並仍在培養將被派往中國和日本以及周邊國家天主教事業的人員。……澳門城的修院中有一座是我們耶穌會院，常駐60至80人，皆因派遣或中轉的緣由。鑒於向各地傳教團輸送人員的需要，人數需保持不同。會院中開設有兩門神學課，一門語法課，一門高階課程，兩門拉丁文課，一間幼童學校——其中的初級班收納了多達九十餘名幼童。他們來自葡萄牙人和中國人家庭。”¹⁰

在那些混迹於傳教士和葡萄牙人圈中，與葡萄牙商貿活動有聯繫的邊緣社會群體中，葡萄牙文教學很難普及。

阿方索·洛佩斯·維埃拉（Afonso Lopes Vieira）¹¹詩中的意象傳達了這種歷史真實的可能性。

“伊內絲·雷利亞
費爾南·平托在中國腹地
（在此歷盡艱險！）
遇到一位葡萄牙老婦人
名叫伊內絲·雷利亞
她開始祈禱：
“我們的天父……”
他明白，這是葡萄牙文。

費爾南·平托聽那聲音傳來
（身陷獄中無比悲傷！）
他露出微笑……
“我們的天父……”
老婦人知道的僅此而已
但已足夠

10.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294至295頁。

11. 阿方索·洛佩斯·維埃拉（Afonso Lopes Vieira）：《陸止於此，海始於斯（*Onde a Terra se Acaba e o Mar Começa*）》，Vega，1998年，第51-52頁，（Edição de António Manuel Couto Viana），Vega，1998年，（Edição de António Manuel Couto Viana）第51至52頁。阿方索·洛佩斯·維埃拉（1878-1946年），偉大的詩人和文學家。相關的其他觀點參見Ana Cristina Alves，“As Intuições de Eça”，*Uma Viagem de Muitos Quilómetros Começa por um Passo. Crónicas da China*，COD，Macau，2004，pp. 99-103。

善良的伊內絲·雷利亞
 我鄉親的面孔
 始自葡萄牙的不朽旅途
 令你儼然中國人的模樣
 而非葡萄牙人
 於是，費爾南的微笑
 你打動了我的心

他在當下領悟到
 旅途的種種遭遇中
 最甜美怡人的吻
 來自語言！

毋須感到奇怪的是國際文化交流領域往往存在這種有趣的錯位現象。1633年伽利略·伽利雷（Galileu Galilei）被宗教裁判拘捕定罪。1614年在北京，他的著作正是耶穌會士科學家們討論的主題。就在1634年，“日心說”被禁止的第二年，他們向中國皇帝贈送了望遠鏡。國際關係中的實用主義總是能超越理論或原則的狹隘性。

《大中國志》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世俗中國”，是對中華文明的寫照，涉及文化、語言、教育，科學以及藝術。第二部分“天主教中國”，是天主教在華歷史的淵藪。

在整本著作中，不難發現有關澳門的珍貴史料¹²，以及對中國人所做的心理——社會學以及外貌¹³描述。作者洞察敏銳¹⁴，力圖理解文化差異，從不追隨歐洲中心主義的時髦。

12.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85頁：“1621年澳門向皇帝運送了三駕大炮和三名炮手。這在很多想來觀看大炮發射的官員中引起巨大反響。一次試射意外造成一名葡萄牙人和三、四名中國人身亡，這令官員們十分害怕。大炮受到重視並被運用到與女真人作戰的前綫。女真人不知新式武器的威力，聚攏靠近炮口，結果被一炮擊中傷亡慘重，他們四散逃竄，從此對大炮格外小心。”

13.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60頁。“……南京省揚州的女人最漂亮，就如在葡萄牙吉馬良斯的女人被認為最漂亮一樣。”

14.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32至33頁：“他們認為保證王朝千秋萬代的原則是：百姓富有，而非少數人富有。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富豪。窮人也沒有像歐洲的窮人那麼潦倒。中國人口衆多。沒有足夠的資金和貨幣填充所有人的錢袋。因此，絕大部分金錢流向極少數人，一部分流向少數人，極少部分留給大眾。”

在他對李之藻著作及生平的描述中，我們不僅看到人們對新事物新思維的反饋，也能看到知識已在全國範圍內傳播的特點：“李之藻生於浙江杭州，中舉人赴京趕考，中進士授官。他結交利瑪竇神父。與利氏交游在當時文人與官員中蔚然成風，他們對歐洲人充滿好奇。李之藻聰敏好學，學識淵博，更與利瑪竇神父結下友誼並與之進行深入對話。他熱衷科學知識，尤其對地圖、奇器十分著迷，以至於與利瑪竇神父形影不離。”¹⁵這是三十年共同相處的友誼、文化、知識和思維方式融合的開始。“李之藻嫻於科學，無所不通，甚至超過了歐洲一些自認為有知識的人。他掌握了歐幾里德著作的前六卷。還學習了算術，包括其中的細節和特例，並在此基礎上編寫了六卷本。李之藻學思敏捷，通曉科學知識及其相關學問。他協助翻譯了亞里士多德著作包括《科因布拉講義（Curso Conimbricense）》中的所有問題，並對其中內容理解透徹。最後，他還學習了邏輯學的大部分內容，並完成了20卷中文著作有待付梓。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知識，他卻成竹在胸。對於任何來自西方的奇聞怪談或令人嘖嘖不已的事情，他泰然處之。向人展示來自歐洲的新書或器物是他的一大樂趣。”¹⁶李之藻的學術生涯達到成熟，與此同時，他接受並實踐天主教價值觀和信仰。

曾德昭對科舉制度——如今被我們稱為中國考試制度——的細節描寫十分突出。這部分文獻在17世紀教育史和中葡教育思想史領域獨一無二而且稱得上是當時的先鋒¹⁷。我們目前還不能考察中國這一奇

15.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399頁。

16.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402頁。《科因布拉講義》是“指十六世紀末科因布拉文學院教授們編輯的八卷哲學資料。它的見解獨樹一幟，甚至篇幅，也異於其他任何哲學家的著作。”皮涅蘭達·戈麥斯（Pinharanda Gomes），《科因布拉人*Os Conimbricenses*》，里斯本，Guimarães Editores，1992年，第二版，2005年。

17. 究竟哪些因素共同影響了教育和文化在澳門的發展？有必要列舉下面的研究：山度士（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SJ）：《澳門：遠東第一所西式大學（*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 Oriente*）》，摘自葡萄牙歷史學院年刊（*Anais da Academia Portuguesa de História*），II série, vol. 17, Lisboa, MCMLXVIII，1994年為紀念聖保祿學院四百周年，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以中英文再版；巴拉特（Aureliano Barata）：《1572至1979年間的澳門教育（*O Ensino em Macau: 1572-1979*）》，澳門教育暨青年司，1999年；安娜·瑪利亞·科斯塔——洛佩斯（Ana Maria Costa-Lopes）：《*Confluências e Divergências Culturais nas Tradições Contísticas Portuguesa e Chinesa*》，澳門大學，2000年；劉焱冰：《澳門教育史》（英譯本），澳門大學，2009年。

特的教育哲學¹⁸被曾德昭介紹到葡萄牙後的接受狀況。曾德昭所嘗試的是進入被歐內斯特·勒南所稱為“考試帝國”，做一次深度旅行。

17世紀葡萄牙教學法的文獻十分稀少¹⁹，1580——1640年葡萄牙失去獨立可謂眾多原因之中最主要的一個。此外，這一時期的葡萄牙知識界從未自覺借鑒或適時接受外國的教育思想²⁰，或其他在世界傳播²¹的外國遊記、旅行者、傳教士、軍人和商人的思想。葡萄牙知識界缺乏政治明辨力，也沒有“聖君一代”（*Ínclita Geração*）或者阿維什王朝的謀略和眼光，後者曾開啓了葡萄牙走向世界的時代。葡萄牙同時代的思想家²²何塞·聖·安娜·狄奧尼西奧（*José Sant' Anna Dionísio*）將這一問題歸結為天主教會，大學以及政權高層的過錯。

-
18. 1937年一位葡萄牙漢學家巴斯托（*Abílio Basto*）在《澳門教區簡報（*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探討有關考試的問題，考試問題是教育體系中重要的環節，後重新集解出版在《中華帝國時代的考試（*Os Exames na China Imperial*）》，*António Aresta*編輯，注釋和前言，澳門基金會，1998年。
 19. 這裏指兩本著作，哈辛多·德·督斯（*Jacinto de Deus*）：《*Braquilogia de Príncipes*》，1671年；佩德羅·桑塔·瑪利亞（*Pedro de Santa Maria*）：《談優秀的子女教育以及基督教對此的策略（*Tratado da Boa Criação e Política Cristã em que os Pais devem Criar os seus Filhos*）》，1633年。大學科目中修辭學和仕林哲學十分重要，如若望·費爾南德斯（*Mestre João Fernandes*）：《關於大學名譽的禱文（1548年）〔*Oração Sobre a Fama da Universidade*（1548）〕》，*Jorge Alves Osório*前言、介紹、編輯，科因布拉大學文學系古典研究所（*Edição do Instituto de Estudos Clássicos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1967年。
 20. 路易士·安東尼奧·維爾尼（*Luís António Verney*，1713-1792），在義大利求學，1746年出版《學習法（*O Verdadeiro Método de Estudar*）》；里貝路·桑切斯（*Ribeiro Sanches*，1699-1783），俄國沙皇的醫生，於1760年出版《談青年教育信札（*Cartas Sobre a Educação da Mocidade*）》。近代有慕拉士（*Wenceslau de Moraes*，1854-1929），曾在澳門和日本生活，1925年出版《日本的教育（*A Educação no Japão*）》一書。
 21. 1605年鄂本篤（*Bento de Góis*）向印度和中國航行；1614年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遠遊記（*Peregrinação*）》第一版問世；“通辭”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Tçuzzu*）於1620年完成《日本小文典》；1624至1635年間耶穌會士首次記述《葡萄牙人在西藏（*Os Portugueses no Tibete*）》；值得一提的還有加斯帕·達·克魯士（*Gaspar da Cruz*）：《關於中國和霍爾木茲王國極為詳細的介紹（*Tra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xtenso as Cousas da China com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m do Reino de Ormuz*）》，約1569年；或者皮萊資（*Tomé Pires*）的《東方志（*A Suma Oriental*）》。
 22. 何塞·聖·安娜·狄奧尼西奧（*José Sant' Anna Dionísio*，1902-1991），《伊比利亞知識界荒疏青少年教育（*A Não-Cooperação da Inteligência Ibérica na Criação da Ciência*）》，*Seara Nova*，里斯本，1941年。

最早介紹中國教育制度的葡文文獻出現在孟三德（Duarte de Sande）於1590年在澳門出版的《天正年間遣歐使節見聞對話錄（*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理查德·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將之譯為英文，以《一篇關於中華帝國社會和政府的出色論文（*An Excellent Treatise of the Kindom of China, and of the Estate and Government Thereof*）》為標題出版，從此成為經典之作。

我們看到曾德昭是如何展開論述並將讀者帶入那些貌似毫無意義的細節中去。文章中也不乏一些幽默手筆，與文風無礙。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語言年代如此久遠，許多人認為它是巴別塔七十二種語言之一。至少據中國文獻記載，漢語有超過3700年使用的歷史。漢語具有多樣性，因為目前王朝所統轄的諸區域具有多樣性。南方全部省份以及北方部分地區曾經處於蠻族的控制之下。”²³

曾德昭在評價文人風尚的時候寫道，“有文采的人受人尊敬。精湛的書法和繪畫受人激賞。人們毫不猶豫地購買精美古代書法作品。”²⁴

曾德昭提醒葡萄牙和歐洲讀者注意，“漢字書寫規範與希伯來文及所有東方文字一樣是自上而下，自右而左。”²⁵

學習需要恒心、遵從、方法和規範：“中國人從年幼時期便開始學習。他們先是念一些關於德行、禮儀和孝道的簡易讀物。數月後，開始念誦經典包括原文和注釋，就如念《聖母頌（*Ave Maria*）》一樣。隨後先生講解大意。課堂同樣以背誦的形式進行。學生們來到先生案幾前，轉過身，書本攤開留在後面。這是唯一的課堂形式。“背書”（*poixu*）即背對著書的意思。這樣做是防止學生偷瞄課本。學習的要求對哪怕年齡最小的學生也同樣嚴格。任何人不能玩耍和休息。”²⁶

23.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73頁。

24.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77頁。

25.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78頁。

26.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1頁。

對學生人格的培養和知識灌輸的過程是同步的。“……他們是有身份的人。學生必須在先生的指導下外出學習禮法，特別是十分講究禮數的拜訪。沒有先生指導學生很容易失禮犯錯。這種方式毫無疑問極有助於建立誠實的聲望，鞏固學問，免受那些有損紳士形象的邪說或惡友的影響。特別在中國，名聲不佳的人不准參加考試。”²⁷

那些必休的節假日是怎樣的呢？“節假日只有15天。新年的頭幾天，第5和第7個月。由於沒有安息日，一年到頭終日學習。努力為學是他們的信念。”²⁸

談到大學，“沒有專門的大學或學校，而是一體式的院所，寬敞而威嚴，備有為考官和考生所建的設施。考生數量極多。這樣的院所設在城鄉間。規格高的則設在州府，鄉試在此舉行。鄉試貢院修建得十分巍峨，以便容納前來應試的生員。所有貢院有統一的樣式。廣州貢院面積不大，只錄取80名。其他地方則錄取100至115名，差別可謂不小。”²⁹

這裏有一段對空間的描述“所有建築都在圍牆之內。南門高大，通向一條寬大的馬路，考生由此前來。幾何長度150步，一步合五足長。沒有房屋。考試期間士兵把守在門廊和條櫓，維持戒備。”³⁰

然後是細節，“第一層院子是第一級官員的處所，其間有士兵把守。第二層圍牆內是一扇門，如同教堂門的大小，分兩扇開合。走進去是一片寬大的空間，水塘從中穿過，走過一座造型精美的石橋，便到了另一個入口。這裏又有士兵把守，不經官員允許任何人不得出入。”³¹

從那裏“穿過那扇門裏面又是一個寬敞的空間。東西兩側有為考生設的號舍，每間有三掌半寬，四掌半長。高可容下一人。號舍頂不用瓦而是平頂。每一間有兩個板子，一個固定做椅子，另一個可活動的做寫字臺，也用作考生餐桌。”³²

27.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2至83頁。

28.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3頁。

29.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4頁。

30.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4至85頁。

31.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5頁。

32.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5頁。

考試組織得可謂細緻入微，“考試期間，每個號舍派有一名士兵，坐在小桌子下面監視考生並為之服務。據說他們口中銜一塊木頭以免出聲影響考生……”³³

曾德昭寫道，“從前皇族和貴族不准擔任任何職務，其中那些想要登科得第的學子也不准參加考試。二十年前，由於多次奏議和多方反對，一些人獲准參加考試。為數不多的人被考官授予學位。”³⁴

哪些人有資格投考呢？“百姓不論出身和職業都可以投考試，除了那些下等人如官員的僕人——不是家僕而是衙門的差役，以及軍士、保鏢、惡棍、劊子手和妓院的看守。”³⁵

考生們要考取的“級別有三種，秀才、舉人和進士。為了便於理解，大體可比作我們的學士、碩士和博士。每個人都有與其相稱的章服。應試卻未考中的學生得不到任何特權，但會被當作本地的賢士而受到鄉親的愛戴。真才實學總能得到承認和讚許。”³⁶

在開始討論考試制度這一部分時曾德昭說道，“令人好奇的是考生們如何參與考試。要知道，這種自童生到進士的科舉階梯對中華帝國具有重大意義。學位等級通過考試取得，官職按照學位等級授予，人生在世追求功名的理想則通過做官得以實現。”³⁷

考試形式是這樣的“考試的消息提前張榜公佈，廣而告之直到考試舉行之日。……知縣給出考題，考生作答，從早上持續到下午。他們只需做一篇文章，完成後交由權威人士統一細緻審閱。最優秀的答卷被選出後，作者姓名被張榜公佈在知縣衙門牆外。考生們便得知自己是否獲得了參加下一級考試的資格。這種資格被稱為‘本鄉提名’。落榜生各自返家。”³⁸

33.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5頁。

34.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6頁。

35.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6頁。

36.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7頁。

37.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0頁。

38.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0頁。

獲得學士資格的考試開始了，“來自各地通過童子試的考生們齊聚州府，由府的官員主持一輪新的考試。考題也是新的，但形式與之前相同。不同的是答題需要更加認真小心，避免在文章任何地方出現紕漏。考官從這些答卷中挑選出200份交給主考官以進行第三輪考試，形式與前大體相同，再從中選出20至25名授予學銜。”³⁹

獎勵是：“頒發章服，授予特權，並聽命於主考官和府中兩名‘學政’（*hioquon*），即主管學問的官員。他們負責監管各級考試並懲罰行為不軌者。”⁴⁰

考官的等級是這樣的，“主考官負責巡視州府各鄉，查訪考中的所有秀才的學習情況以及他們參與過的其他行當。”⁴¹

於是我們就能理解接下來的高階考試：“通過審核的受到獎賞，行為懶惰的受到懲罰。所有考生被召集在大廳內，按照考題撰寫文章。結束後，文章被分為五個等級。第一等受表揚，第二等受次一等的表揚，第三等通過，第四等受處罰，第五等被剝奪學銜、章服和特權，降為平民，但是以後仍可參加考試。”⁴²

參加考試的花費不可小覷，“第一輪考試中，優秀者自各城選取40名，各鄉20名。每人花費不過8 埃斯庫多（*escudos*），全國計算，皇帝需花費300000埃斯庫多。這項工程規模驚人，涉及444座城市，1150個鄉鎮。這就是考取、維持和獲得學士學位認可所必需進行的程序。”⁴³

碩士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全國統一在八月的同一日在各州府舉行。相當於西曆九月底十月初。”⁴⁴

考試程序極其複雜，持續“25至30日之久，儘管考生僅參與3天，分別在第9日，第12日和第15日。考官包括全省最高長官，屬下官

39.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0頁。

40.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0頁。

41.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1頁。

42.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1頁。

43.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1頁。

44.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1頁。

員組成的同考官，他們都聽命於皇帝派到各省的考官。與他們一起聚集在官府的還有書記員，抄寫員，衛兵和侍從。還有大夫，以備意外發生。在整個過程中任何人不許入內。”⁴⁵

曾德昭親眼所見：“官員們齊聚考場，來自各省各學校超過7000名考生在早上九點有秩序地紛紛入闈。這樣做為了防止擁擠甚至傷亡發生。我曾在南京松江和江西考場目睹意外發生。”⁴⁶

開始時，“立即公佈由主考官事先準備好的考題，用醒目的大字寫在白板上，懸在闈場的四角，以便各位考生在其位置都能清楚看見。”⁴⁷

接著，“考生就考題字斟句酌地撰寫簡潔優雅的文章。每人需完成七篇文章，字迹需要清晰工整不得有省略。若需要增補內容，需要在一行結尾標註。”⁴⁸

為保證匿名和公正性，“考生需要呈交兩份試卷。在其中一份署上自己的姓名以及父親和祖父的姓名，署一個化名，以及出生年份與年齡。這一份試卷從外面遮蓋起來，只露出假名。”⁴⁹

第二次“考試設在當月的第12日，形式與前相同。但是題目變為論述三個有關治國策略以及如何向皇帝勸諫的問題。通過了這兩場考試之後，許多被淘汰，通過的考生參加第三次測試，設在當月的15日，同樣需要論述三個有關法統的問題。”⁵⁰

最後，“當第三場的試卷收訖。貢院關閉約十五日進行閱卷。優秀的試卷被選出將被授予相應的學位。主考官做最後的審核並按等級逐一劃分。位居榜首的人在聲譽和官位明顯都有別於他人。”⁵¹

45.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1頁。

46.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2頁。

47.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2頁。

48.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3頁。

49.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3頁。

50.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4頁。

51.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4頁。

當結束了“最後一項工作，即謄寫試卷，便開啓先前被遮蓋起來的試卷，驗對化名和實名。這些名字將會按照考試結果的先後排列，張榜給那些等待結果的人們，考生的兒女、兄弟、父母、親朋或恩主、夥伴，或者是那些看熱鬧的人。”⁵²

考試結果公之於衆，“被錄取的考生得到通知後騎馬來到貢院，按照順序，由巡撫和布政使司授予相應的章服、流蘇和靴子。衣裝換好後，他們向主考官拜謝，主考官起身還禮如同對待與自己同級的人一樣。而考生們則視他最為自己的靠山，顯得無比尊重。他們以兄弟相稱，稱科舉的兄弟，因此互相尊重。”⁵³

曾德昭在此略顯諷刺地說，“當這些人取得功名博得地位和尊重之後，不知怎的，就變得富有起來。他們不再煩勞雙腳，而是騎馬代步，或乘坐使不完的轎子。全家與榮俱榮，忙著置地建房。他們中許多人不過是剛剛從家鄉徒步趕考的窮書生。他們背著進城才換上的衣衫，剛剛洗乾淨那因為修理破舊的房子而弄得滿是污泥的雙手。我在南京親眼目睹了幾個例子，感嘆不已。”⁵⁴

曾德昭不忘做預算，而且是大額的統計，“那些準備進京趕考的舉子們每人從布政使司獲得80埃斯庫多的盤纏。這一點令我不得不相信中國人是配得上信仰的人。皇帝支付在進京趕考舉子身上的花銷，加起來足有1000埃斯庫多。若按全國計算，有150萬埃斯庫多。這是王子為統治他的皇位而培養賢士的花費。這些資助鼓勵學子們有志向學。”⁵⁵

那些有志考取博士的人都瞭解“考試於二月在京城舉行。大致相當於我們的三月。”⁵⁶

博士考試“只錄取350人。他們的章服除了靴子相同，與碩士的章服在價值和裝飾上區別很大，而且多了一條束帶。這些章服是為他們

52.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4頁。

53.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5頁。

54.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5頁。

55.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6頁。

56.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7頁。

將來作官準備的。束帶會因為職位的升高而選用更加貴重的材料。當接受了學位領到章服之後，他們來到皇宮的一間大殿，參加另一項考試，考題是治國良策。……皇帝，親手向每個人頒獎，頭三名被授予特別的頭銜。……榮譽至高無上，相當於我們的公爵和侯爵。他們在全國包括將被派往到任的地區都享有極高的榮譽。他們相當於古代的君王，但他們的權利與博士所相稱。”⁵⁷

除此以外，還有一項進入皇家學院的考試：“當所有的慶祝儀式完畢，還有一項自願參加的考試。但是幾乎沒有人缺席。考題要求論述關於皇家學院的政策。選出30名最優秀者，淘汰5名。他們一經入選就被優先委任重要官職。餘下的25名住在特殊的府邸，師從一位閣老（*colao*）。閣老要求他們每天做文章，研習文學和治國方略。這項學習持續至下一輪殿試，招入新一批進士為止。前一批學生開始憑藉資歷和學位擔任宮廷內的重要職務。也不排除被外派做主考官，或擔任短期職位的可能。他們不會做都督，因為都督的職位不及他們。只有屬於皇家學院的人才能擁有‘閣老’頭銜。”⁵⁸

作者是這樣結束這一部分敘述的，“總而言之，物質的世界沒有差別。很難想象沒有權勢的人能受到敬仰和愛戴。這是或許出於真心的熱情或許出於利益的阿諛奉承。”⁵⁹

曾德昭從不同的方面為我們介紹了中國文化的全貌，並且將之與葡萄牙和歐洲文化做對比。

中國的知識“很難做細緻的劃分和清晰的描述，因為實際上，中國人不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其他哲學家、智者那樣區分類別和名稱來研究知識。對很多科學和藝術，中國人很少甚至從不提及。對於如何統治國家的知識他們講得很膚淺。”⁶⁰

語法是“通向其他知識的大門。假如我們按照科爾奈利烏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和其他智者所認為的那樣將語法狹義地理解為

57.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8至第99頁。

58.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99頁。

59.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0頁。

60.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1頁。

語言，那麼語法根本沒有受到中國人的重視。因為詞語是單音節的，沒有變格，所以構成並不複雜。儘管如此，寫作的難度卻很大，因為要加入一些副詞和助詞。假如我們像波利希安（Ângelo Poliziano）那樣擴展語法的涵義，——波利希安很受中國人的喜愛，人類語言範圍極廣，假如寓言和神秘故事數量不多，還有數量很多的歷史、諺語、格言幫助修飾文章。”⁶¹

邏輯和辯證法，“他們僅知道自然教給他們的規則。”⁶²

修辭學，“他們使用頻繁，但是沒有形成任何的規則。通常是模仿別人文章中的用法。”⁶³

算術“受到他們的喜愛。四則演算法非常完善，我在他們的書中看到不少證明和圖像。”⁶⁴

代數“一無所知，總體上沒有探索。”⁶⁵

地理“知識足夠多，儘管不瞭解遙遠國度和王國，也不瞭解這些國家的方位和疆界，但對自己的國家他們劃分得很清楚。”⁶⁶

關於數學，“他們非常好奇，儘管瞭解有限。除非有皇帝的旨令，任何人不得以學習數學為業。這樣的數學家只有兩個，一位在北京一位在南京。他們有官員的協助，同時也是皇帝的數學家。他們除了向作為繼承人的兒子們教授數學以外，誰也不教。許多古老的書籍記載了數學知識，如行星、恆星運行和占星和算命的著作。中國人十分熱衷這類學問。”⁶⁷

音樂“在古代中國受到很高的尊重，孔子經常演奏音樂。在他做官的國家，他教授音樂。如今的中國人抱怨樂譜和幾乎所有的書籍都失傳了。因此音樂不受貴族的重視，而多在戲劇中使用。”⁶⁸

61.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7頁。

62.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7頁。

63.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7頁。

64.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7頁。

65.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7頁。

66.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08頁。

67.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10至第111頁。

68.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12頁。

詩歌“受到中國人的尊崇。古代諸侯國每三年朝拜皇帝時，必須帶來流行於該國的詩歌，通過它們的內容判斷習俗。實際上許多文化習俗能在詩歌中體現出來。……詩歌的種類很多，使用韻腳，就如歐洲的十四行詩、抒情詩、短詩和情歌。”⁶⁹

繪畫“奇特但不完善。不會用陰影或畫油畫。人物肖像毫無精神可言。樹木花草，鳥類等則畫得惟妙惟肖。一些學習了我們畫畫技法的中國人的作品非常精美。”⁷⁰

醫藥“在中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有很多優秀的古代醫書，我們無法與之相比。”⁷¹

曾德昭為我們留下的精細描寫也包括了教育在十七世紀中國複雜的社會中的地位。

教育在中華帝國的社會結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教育造就了知識精英和貴族。他們攀著科舉考試的階梯獲得政治地位。社會特權地位和科舉考試之間的親緣關係解釋了科舉制度長久且穩固存在的原因。

官員代表了一個國家政治、文化和軍事的精英。這個階層擁有特權、權威、權力和經濟資源。令人好奇的是，曾德昭並未介紹武官考試及各級官員所授的章服。

科舉考試制度起源於唐朝（618年——907年），考試頭名限於王公貴族的後代，因此被稱為“陰影下的特權”。宋朝（960年——1279年）將科舉考試定為升官的必由之路。與此同時學習的內容被規範化。元朝（1206年——1368年）科舉考試被中斷而日漸鬆弛。明朝（1368年——1644年）復興了科舉考試制度，並向考生敞開機會大門，面向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與此同時，木板印刷的書本價格也降低了。

69.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14頁。

70.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15頁。

71.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115頁。

這種僵化和抑制創造力的制度⁷²在明朝逐漸衰落，不僅因為特權遠遠勝過了行政職責，更因為權力、價值觀和知識之間的衝突開始在社會組織體系中造成分裂。傳統的存在（孔子編修的《五經》，彙集儒家思想的《四書》，官修歷史，古代算術）與現實對實踐和精確科學的需要之間的妥協，可以看作是一個制度和權利社會的昇華過程。

耶穌會士，作為傳遞另一種科學、人文、藝術和文化精神的使者，有力地推動了延續幾百年的科舉考試走向末落的開始。⁷³

曾德昭說“極少有人擁有博士的榮譽卻沒有為此付出辛勞的。”⁷⁴在此是指哲學家朱熹麼？他為科舉考試制定了龐雜的制度。

一個待解之謎。

72. 潘日明神父（Benjamim Videira Pires, SJ）講到一種利用科舉考試獲利的行為，令人難以想象：“闖姓彩票（Vae-Seng）是中國人的另一種惡習，（澳門從一個世紀以前開始）。當科舉考試在北京或廣州舉行時，每張彩票上包括20名考生的姓名。每一千張彩票組成一個系列，每個系列組成一注彩，有三個號碼。擁有得第考者數量最多的彩票得中獎金。彩票面值有0.5澳門元、1澳門元、2澳門元、3澳門元、5澳門元和10澳門元。10澳門元彩票可贏得多達6000澳門元的獎金。中國政府允許廣州買賣彩票。彩票經營者每年僅向葡萄牙政府繳納36000澳門元。”（《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融合（*Os Extremos Conciliam-se*）》，澳門文化司署，1988年，第195頁。）

73. 兩本經典研究，賴恬昌：《一個儒生在帝制中國（*A Scholar in Imperial China*）》，香港：必發圖書有限公司（Kelly & Walsh），1970年；Robert M.Marsh：《儒吏，中國領導階層之流動（*The Mandarins .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 1600-1900*）》，臺北，南天書局（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1970年。

74. 《大中國志》，第二版，第83頁。

